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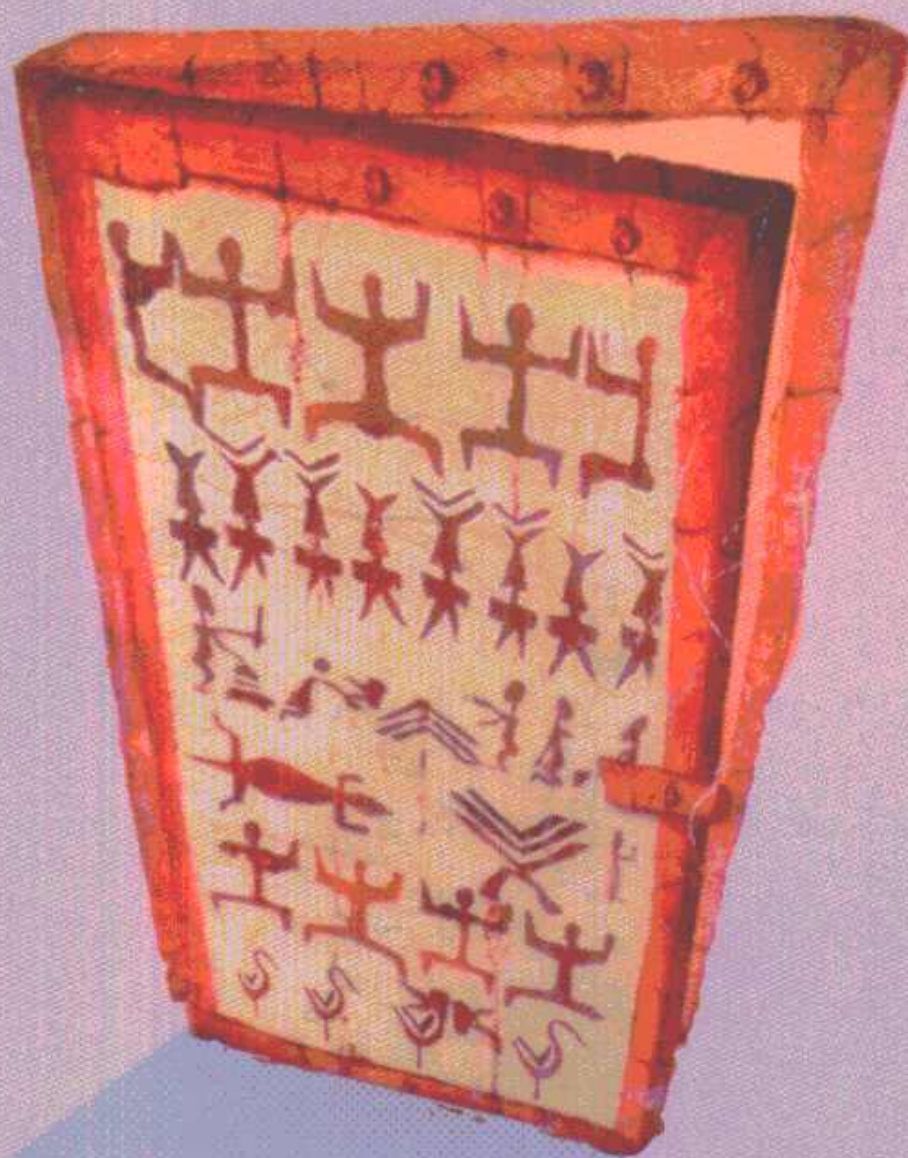
WORLD CULTURE REPORT

世界文化报告

(1998)

文化、创新 与市场

*CULTURE, CREATIVITY
AND MARKETS*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北京大学出版社

UNESCO Publishing /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61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出版

6
111-2
World Culture Report 1998:
Culture, Creativity and Markets

世界文化报告

——文化、创新与市场

(1998)

关世杰 等 译



A0936236

UNESCO Publish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北京大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0-014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化报告:文化、创新与市场(199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关世杰等译.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7

书名原文: World Culture Report 1998: Culture, Creativity and Markets

ISBN 7-301-04305-8

I. 世… II. ①联…②关… III. 文化事业-世界-调查报告 IV. G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2029 号

Original title: *WORLD CULTURE REPORT 1998*

© UNESCO 1998

©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0, for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The designations employed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material throughout this publication do not imply the expression of any opinion whatsoever on the part of the UNESCO Secretariat concerning the legal status of any country, territory, city or area or of its authorities, or the delimitation of its frontiers or boundaries.

The author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choice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facts contained in this book and for the opinions expressed therein, which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UNESCO and do not commit the Organization.

ISBN UNESCO: 92-3-103490-1

书 名: 世界文化报告——文化、创新与市场(1998)

著作责任者: 关世杰 等 译

责任编辑: 范一亭 徐 刚 fyt@pup.pku.edu.cn

标准书号: ISBN 7-301-04305-8/H·487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cbs.htm>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28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版者: 兴盛达激光照排中心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发行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30.25 印张 774.4 千字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0.00 元

前 言

洛德斯·阿里斯佩(Lourdes Arizpe)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助理总干事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一份《世界文化报告》源于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创造性的多元化》一书的首要推荐建议。《世界文化报告》的任务是：调查文化和发展方面的最新趋势；观察影响世界范围文化状况的各种事件；建构量化分析文化的标识；凸现好的文化实践与政策；分析具有普遍重要性的特殊专题并附带提出政策建议。教科文组织的前总干事费德里克·马约尔先生同意，这种报告应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两年发表一次，报告应由一组独立的学者们撰写。

《世界文化报告》的重要性在于它具有多学科的特点：政府和广大公众不断指出，需要用多种专门的学科领域的观念来阐述这些问题。因为它是一个新的交叉性领域，对此第一次是用《我们创造性的多元化》来描绘的，目前它还不是对文化现状进行学科式的评论。面前的这份报告，实际上是建构这门学科的第一步。

遵循着《我们创造性的多元化》的总体框架和方针以及教科文组织促进跨文化对话的原则，本报告有实践它所倡导的方针的义务。本报告打算尽可能地成为一种跨文化的成果，因为我们邀请了来自许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来撰写本报告。可以毫无疑问地讲，本报告对文化上设定的假设提供了确实的资料：它力求甚至不遗余力地通过提供本领域中确凿和对比的数据，来考察当前形势下与文化和发展有关的现象的特征。希望其中一些数据以及与之相伴的解释，将对该领域相关问题上的沙文主义的看法、混乱的论点和对种族问题的政治操纵，提供强有力的反驳。

鉴于本报告事实上是个正在开拓的新话题，其中的许多发现和建议应被看作具有初步性。但是它们非常重要，政府、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文化积极分子应针对有实际后果的活动和政策，思考与利用这些发现。

特别是，应做出文化和发展的量化指标和索引并加以检测，以便达到更精确的统计分类和统计方法，使政府能够在该领域搜集必要的数据库。在统计表中可以看到，数据必须在许多领域里进行搜集，重要的是，新的现象尚须加以命名。

本报告如同《我们创造性的多元化》一样，在各章中对文化的构成和功能两个方面进行了讨论。例如，本报告深入探讨了文化被用于解释发展和特征的方法，换句话说，就是探讨了“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以及同等重要的“我们正在走向哪里”。同时，探索了文化可以通过文化产业、工艺美术市场和就业有效地与经济行为相结合，从而增加人民收入或福利的种种方法。

教科文组织特别欢迎这份报告。作为《我们创造性的多元化》的一份后续报告，它把所讨论的问题扩展到对该组织文化部门的项目所计划的各种活动。本报告以经济互相依靠、全球的创造性、国家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新的传播和信息技术正在出现等新环境为写作背景。它

的分析也涉及到政府所关心的正在出现的新情况：文化以及文化与全球经济政策的关系、民族和语言多元化主义、城市跨文化主义、可持续发展、民主和全球伦理。

像文化这样靠近我们心灵的议题，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引起热烈的争论。我们利用可以得到的最可靠的数据，从非中心化的观点，做了开拓新领域的选择。我们宁愿看到人们在读这份报告时大发雷霆，忿然争辩，而不愿用平淡无味的老生常谈为他们唱催眠曲。

随着时间的推移，本报告很大程度上就如同今后教育所遵循的方式，将被看作是一份前进中的课题，一个伴随终身的、互动的、长距离的对话。讲述者构建了她/他所熟悉的环境。而其他一些声音正在这里创造新的现实，我们希望很多其他人将及时地加入到这一新的创新过程中来。决策者们能帮助扶植这项工作，那他们将成为胜利者。

本报告书页上一些背景由多人所画，他们包括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的一些支持这项科学工作的成员：约罗·法勒(Yoro Fall)、库尔特·富尔格勒(Kurt Furgler)、基思·格里芬(Keith Griffin)、伊丽莎白·热兰(Elizabeth Jelin)、基·纳卡恩(Chie Nakane)，以及在海牙社会与文化计划办公室的阿德里安·范德施特依(Adriaan van der Staay)。本报告组的成员还包括路易斯·埃默赖(Louis Emmerij)、保罗·斯特里特恩(Paul Streeten)、达拉姆·盖(Dharam Ghai)、列奥·戈德斯通(Leo Goldstone)、戴维·思罗斯比(David Throsby)和特里·麦金利(Terry McKinley)。

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费德里克·马约尔先生，坚定地支持本报告的独立性，使得这份报告成为可能。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前主席雅维耶·佩雷·德奎利亚尔(Javier Pérez de Cuéllar)给予了许多鼓励和忠告。《我们创造性的多元化》后续指导委员会的马赫布卜·乌勒·哈克(Mahbub ul Haq)和其他成员对本报告作了高水平的学术评价。荷兰政府为本报告提供了慷慨的财政支持。

本报告也得益于教科文组织中许多专家的意见，他们对本报告的评论以及对教科文组织理想的持久信仰是跨文化合作的一个光辉典范。

(关世杰译)

第一部分 文化与经济发展

引言

在第一本《世界文化报告》的第一部分里,我们选择了探讨发展模式的文化假定,或是说探讨世界范围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问题。我们能说发展模式种类在前进中减少了吗?能说随着国际化和全球化程度的提高,机动性的空间已进一步缩小了吗?今天是否还存在着不同的发展方式?如果有,文化的角色是什么?

为此,本报告第一部分对文化进行了广义的界定: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这包括人们所持的价值观,对他人(民族和性别)的容忍,外在的以及与之相对的内在的取向和偏好,等等。当然,对文化也可以加以狭义的界定(正如本报告后面各章中的界定):文化是艺术、音乐、文学等方面的体现。

西方种族中心论已经习惯地被用作思考发展的不容置疑的基础。虽然有多种可供选择的发展战略已得到承认,但是,发展等于现代化和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范式,长时间以来一直是,现在仍然是习惯的看法。伴随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许多悖论之一是:地区的独特性现在正受到比以前更大的压力。全球化刺激了地区化,这种情况会出现。或者更明确地说,全球化导致了文化的渗透,这种状况反过来导致了文化替代的增加和新的“地区性”文化的生长。文化多元性正在日益成为各社会无所不在的特征,民族特征通常是对全球化压力的常规和健康的反应。由于人们越来越把文化作为自我界定和自我动员的工具,全球同一化日趋增强的印象因而可能产生误导。

全球化标志着寻求基于地区差异发展模式类型的真正开始吗?我们说“地区的”而不说“民族国家的”,因为几乎所有社会在构成上都是多元文化的,因而把文化特征等同于民族国家的特征是错误的。文化自由——正如《我们创造性的多元化》一书所指出的——“让我们自由地满足最基本的需要之一,即界定我们自己基本需要的需要”。但是,由于界定一个人自己的基本需要是一回事,获得这些需要的途径——通过经济和社会政策——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很容易想像出这是一种如下的处境,即不同文化界定了一批不同的基本需要,可这个环境中不同文化的发展模式(即要达到这些不同基本需要所通过的政策)却基本没有什么差异。

我们的论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 西方文化已牢牢地牵制了关于发展的思想和实践;
- 这种影响在过去大约 20 年,通过全球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力量有增强的趋势;
- 但是,的确存在着基于不同文化的、机构的和历史背景的可供选择的种种发展模式;
- 而且,这类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似乎在全球化时代会增加,不管呈现成什么样,全球化可能会自相矛盾地看到进一步的多元化而不是统一化。

日本一贯在全球化、发展模式和文化问题上坚持自己的观点。日本遵循着以下路线: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只有一种普遍模式或一套规则,并不意味着阐述当前经济和金融的正统说法(这

一正统的说法已从美国和欧洲传到了拉美、东欧以及非洲部分地区)将最终传遍全世界。因而,世界不会在经济上或文化上变成同质的。日本人的观点认为,地区化或一种带有地方文化价值的特征正在与全球化同时进行。

现行的正统理论——被称之为统一(uniform)模式——在政治方面由多党制的国会或议会民主组成;在经济方面,由新古典主义市场经济组成。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倾向于把这一普遍的模式片面地运用到所有的国家,不顾适用国的历史、机制和文化方面的背景。但是,总有一些怀疑论者,他们认为经济体系、制度和文化是多元的,并强调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对怀疑论者来讲,关键的概念不是同一化,而是多元化和相互影响。在这方面,日本以及其他东亚国家是与众不同的:它们的体制得到现代化和工业化,同时又保留了它们自己的传统和文化。

许多经济学家一直主张,在许多方面,废除规则必须尽可能彻底地、同时地和迅速地加以实施。但是这种方法潜在地假定了英美的制度和对这种制度有补充作用的社会环境已经存在,或者假定了在顾问和国际组织的帮助下,该制度可以由开明的改革者很快地建立起来。

忽视不同文化的正当性和历史进化过程已经导致混乱和现存制度的崩溃,而不是导致改革。替代的办法应是策略地有选择地废除一些部门的某些规则,同时仍旧控制着另一些部门,至少开始是如此。如果必备的基础设施,像中央银行制度和有效管理的企业制度不存在时,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如何能运转呢?把一个统一的模式强加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可能会危及这些国家的经济前程,在更大范围内会危及世界经济前程。我们现在似乎处在十字路口上,在这里必须追求可供选择的多种方法,必须选择多样性而不是统一性。

这里所提出的要点就是各地区应深思熟虑地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制度模式和民主模式。的确,如果人们接受了将来受到过去的强烈影响,即道路取决于历史条件这种思想的话,各地区必须建立自己的模式。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超越时间和历史的世界中。世界宁愿从系统的多样性中受益,也不愿由于强行实施一种统一模式而引起混乱和可能的大灾难。统一性最终会走向枯竭。

然而,谨慎极为重要,我们不应陷入过分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极端的相对主义非常容易堕落为无价值的虚无主义或是危险的无政府主义。这里重要的问题是掌握住带有不同成分系统的总体性。换句话说,带有地区差异的全球化。

我们应该热切希望:在将来有一种联结世界所有地区或国家的,同时又尊重各地不同文化和特定的社会经济系统的相互联络的全球体系。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观察到了分歧相当大的模式,而只是说,我们不应把正在推进统一的模式加在发展中国家和正在转变的国家头上。

至少我们能说:非洲或拉美特定的历史经历似乎意味着其体系在一些重要方面将区别于美国人的模式,正如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模式不同于德国的模式。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认识到,在特定的发展道路上各个社会有所不同;各个社会有自己的政治、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国家作用和国家政策的实体会依各社会的政策、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的需求而不同;因此,对一个社会适用的政策可能不适用于另一个社会。

鉴于东亚发展显著的成功经验(尽管在1997年发生了金融危机),需要一种有差异的方法一直很明显。而且,我们必须面对令人不安的现实:许多在过去15到20年间采纳了当今正统理论的国家,正经历着收入不平衡的恶化、有时贫困愈甚就业率则愈低的状况。当然,在一些还没有接受现今正统理论,但已参加到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也看到了类似的现象。因而,当因

果关系未被充分理解时,全球化、经济正统理论、不平等与贫困问题的加剧,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是要认真思考的一个原因。

根据《从边缘拉回》(*In from the Margins*, Council of Europe, Strasbourg, 1996, p. 9)的说法,如果优先考虑的一件事是“把千百万被剥夺者和处于不利状态者从社会的边缘拉回到社会之中,把文化政策从统治方法的边缘拉回到统治方法之中”,那么,通过采纳根据不同社会的需要、机制、历史和文化而制定的发展模式,把两者拉到一起就是绝对的必要。

本章谈论的范围并不大,但比人们乍一看可能猜想的要宽泛。它包括机制、消费习惯、土地权、市场介入、销售体系、经济民主等问题。发展中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将会提供的多样性至少会同它提供的统一性一样多。

第1章 文化与经济发展

J. 莫汉·拉奥(J. Mohan Rao)

美国阿默斯特马萨诸塞大学发展经济学专家、教授

全球时代的文化与发展

过去的两个世纪以来,尽管世界生产物质产品和服务的能力有巨大的扩展,但是,今天发展经济依然非常急切。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穷国的这种急切似乎不言自明。依据世界银行估计,被定为“绝对贫穷”的人口(他们大多数居住在不发达国家)在上个一千年最后十年里的增长率,基本上与世界人口增长率相同(Jolly, Rosenthal and Tokman, 1994)。即使在一些地球上最富裕国家里,失业人口和不充分就业的人口,以及经济不安全性和脆弱性的水平也依然居高不下。此外,在许多国家中,包括穷国和富国,也还存在着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增长的令人烦恼的迹象,尽管可能平均收入在继续增长,但这一趋势加重了人们对经济上被剥削和社会上不平等的感受。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扩展已经迎来了一个真正的全球时代,即以贸易、投资、金融和技术的跨境流动为形式的国际化经济相互依赖和迅速增长的时代。另外,由于许多政府已选择(或被迫)对内外经济实施了自由化,这一全球化的进程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已得到了很大的加强。

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影响不仅局限于经济和政治层次。经济全球化已经迅猛地增加了国际间信息、思想、信仰和价值观的交换。虽然,政治经济的影响——对国家、公司、工人和消费者而言——理所当然地是直接的和可以接触到的,但全球化可能也对文化层次(即人们共享的信仰、态度、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有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但是经济与文化的关系绝不是一种单向的影响。由于世界以文化多姿多彩为特色,因而,文化也可以被看成通过全球的互相交换而互相影响,对地区和全球的经济变化过程产生反作用。这种交换和相互作用可能会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这也可能是一种文化同化或冲突的根源。如果在全球化的背景中,经济增长有能力不仅转变个人和集体的生活方式,而且也转变了估价这些可供选择生活模式的核心基础,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问,经济变化如何得以促进而不伤害一个国家传统中有价值的成分呢?

可以肯定,常规经济学基本上无条件地拥护全球化和自由化。特别是自由经济学提倡一种不管富国还是穷国均执行严格统一的经济惯例和公共政策。这是建立在这样的主张之上的:当这类市场不受干预和没有政策强加的障碍时,所有参加到国际市场的国家的相互经济收益都是最大的。类似的论点也支持在国内市场上实行不干预主义。的确,没有保护主义者和其他阻碍顺利运作的障碍,可以期望全球市场和国内市场会拉平国内和国际的生产率、价格和收入。虽然到处都在运用,但是这些论点以及依据它们建立起来的经济模式并没有被普遍接受。一种主要的反对意见是:全球一体化的市场不可能期望会对弱势经济和强势经济产生对等的收益。世界上存在着一些强势的经济势力,它们造成并维持着在各国国内和各国之间的

不平等的(而非平等的)发展。这些势力与现实存在的国家间巨大的经济差异有很深的牵连。平均计算,这些差异在过去40年间眼见着扩大了。同样,各国从历史中承袭了不同的问题和不同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资源。因而不必惊奇,各国会希望或需要用多种不同的方法处理自己的国情。特别是对穷国,要利用由市场和技术提供的机遇就需要:(1)对国内国际的市场和长期经济管理方面的战略性国家干预;(2)在各种层次上的社区参与机构,而不是由自由经济正统派所界定的国家最少干预的政策。然而,对富国和穷国都一样,全球化显现出正在缩小追求自主政策的可能空间。一些人从这种发展中看到了可能发生的(的确很可能如此)政治和经济危机,这种危机要求避开现在占主导地位的取消管制的全球化和自由化所开出的新自由化处方(Greider, 1997)。各国如何能够为自己创造政治和经济能力,做自己认为合适有价值的事情呢?

然而,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严峻的一元性,不是全球范围内增长着对全球化感到不安的惟一来源。由于国家的政策和机制日益受到全球金融市场的仔细审查,财政制度和劳动力制度屈从于日益增长的“国际竞争力”的指令,受人珍爱的传统和生活方式日益显现出受到威胁,国家自主的意识正在随之逐渐地丧失说服力。一些观察者担心,经济全球化的骇人的毁灭力量将产生一个文化同一的世界,单一的男女世界,就像单一农业一样,人类将会丧失自己的创造性潜力和适应性的弹力。同样,全球化也有拥护者,他们从同样的趋势中找到了希望,那些曾长时期把人类大家庭分开的显著的和隐蔽的差异与区别会被克服,并为非常需要的全球合作打下基础。但是这种希望似乎是依赖于尚未实现的期望,即全球的不平等将会逐渐地消失。作为自由经济的一部分,它倾向于把文化作为经济的无足轻重的表面现象来对待,或者作为个人选择领域的一种表达(自由市场认定要促进和迎合它)。

但是市场鼓励和市场繁荣所依赖的以个人方式对个人目的的追求,并不能确保进一步的个人和集体目的所需要的社会安排会被满足。我们集体能力意义上的文化自由“要满足的最基本的需要之一和界定我们自己基本需要的需要”(World Commission o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1995),甚至并没有进入自由的字典。然而,我们需求中最基本的东西现在被全球的压力和全球的忽视所威胁。这种对文化自由的威胁不能不意味着对民主和社区的一种威胁。全球化将会在国内和国家之间产生文化和谐还是文化矛盾?反过来说,全球文化的多元性和自由,能否在不伤害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创造性进步的条件下被保存下来呢?

当全球时代破晓时,这些与文化、发展、全球化相关问题的紧迫程度,不亚于像全球环境日益恶化这类有关我们共同前途的最重要的问题。毫无疑问,可行的答案只能通过运用我们集体的自由的创造性才能找到。我们集体的自由只能通过集体自由的有意识的运用才可以得到保护和促进。

亚洲金融混乱之展望¹

如果不是几十年以来,也是多年以来,政治家和专家们尽管在“东亚发展模式”的构成上有不同意见,但都一直赞扬“东亚发展模式”。的确,在1965~1995年的30年里,东亚的四“小龙”(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人均生产总值达到年均6.6%的增长率,中国相应地是5.6%,

东南亚是 3.9%。相形之下,南亚是 1.9%,经合组织是 2.1%,拉美是 0.9%,下撒哈拉非洲是 0.2%。

去年夏天,许多亚洲国家货币突然大幅度贬值,股票交易价格猛跌,政治家和专家们斥责当地的腐败风气、脆弱的银行体系、终身的雇佣制等,把这些当作崩溃的原因。

实际上发生了什么?

1997 年亚洲的货币危机不是亚洲经济迅速发展的终结,而是一种常常伴随经济迅速增长而出现的(难以预见的)金融不稳定的循环模式。正如印尼、马来西亚和韩国从本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金融危机中迅速地得以恢复一样,亚洲的经济似乎会在 2 到 3 年内恢复迅速增长。的确,货币危机源于错误的汇率,这一汇率受到了自由化和全球化经济中市场力量的严厉惩罚。然而,亚洲经济的长期性基础依然完好无损。

虽然,西方国家目前正在从世界收入失调份额中获得好处,但是,当全球市场的力量进一步深入地渗透到亚洲时,西方国家的份额将会缩小。到 2025 年,亚洲可能将重新获得它曾长期享有的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在那时亚洲可能占世界收入的 60%,而西方国家的份额将从现在的 45% 降到 20% 至 30% 之间。

虽然,面临现在正在冲击着亚洲的经济休克时,这种长期性的估计可能似乎不容乐观,但是,货币不稳定可能反映的是由不稳定投机而恶化了的短期金融考虑,而不是当地经济增长的长期危机。主要的解释是:许多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在 90 年代把它们的货币按固定比率与美元挂钩,尽管该地区的贸易不只是依赖于对美国的出口,而且也依赖于欧亚的市场。1995 年中期之后,美元开始急剧地对日元和欧洲大陆主要货币增值。结果,亚洲的货币也急剧地对日元、欧洲及其他货币增值。结果,亚洲的出口变得日益没有竞争力,被价格挤出了欧洲和日本的市场。所有这些原因造成的后果是,这些国家的出口增长开始下降,国家日益陷入了大量偿还债务的赤字经济,汇率便自然地遭受到了压力。

还有第二个原因与金融危机相关。在 90 年代中期,外资流入日益增长的份额似乎是被房地产吸引在投机性投资方面。随着许多国家对金融市场解除控制,亚洲的商业银行从国外借来美元,并把钱贷给国内的房地产开发商。这样,当 1996 年财产市场萎缩、1997 年货币贬值时,银行受到了未完成贷款的打击,许多银行面临破产。

货币危机可能将对银行体系的健康发展和建筑业投资有持续二、三年的影响,因而,1997 年和 1998 年的增长率将会低于前些年。这次危机也突出显示:需要对金融市场加以更好的规范和监督,以此作为将来更稳定发展的条件。

展望未来,(恰当地应对)货币危机对该地区的根本战略或中期增长前景不会带来问题。

路易斯·埃默赖(Louis Emmerij),经济学家,美国华盛顿特区美洲开发银行董事长特别顾问

文化的创造作用

社会生活在个人能力发展方面不仅发挥着功用性作用,而且还具有重要的构成性角色和独立的价值。社会关系影响着个人的能力,影响着个人作出选择的标准。尤其幸福的体验可

能是人际之间的而不是完全个人的:这类行为可能被社会羡慕和同情所驱动,不只是个人利己主义的动机。在这种情形下,人的发展必须通过考虑这种相互依赖,用社会的或相关的术语来界定和测量。如果这种相互依赖由于时间和空间而不同,那么人的发展的概念就不能统一于所有这些不同的条件。甚至如果我们把人的发展只参照于个人的机能,而非个人的情感,也没有理由支持个人能力和机能不被社会所影响。个人的机能可能受到家庭、公司、各种集体组织和大的社区其他形式中人际关系的支配。例如,在机构中,权力的影响在发生作用就是这种情况。且不说评价和机能相互依赖,社会生活也可以强烈地决定着特定的信仰和价值观,个人正是通过信仰和价值观作出选择。的确,社会的个人典型地发展了他们关于社会本身如何构建的信仰和偏好。如果上述任何一个社会条件维持的话,那么就不存在人类发展的统一的(通常在各时期或跨社会都一样的)尺度。

当求助于环境中的人口和物资特点以经济术语解释不同文化的作法时,并没有解决基本问题。例如,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是,虽然近几十年中印度嫁妆费用的提高似乎与同期的男女人口比例失衡和一直在变糟的事实相冲突,但它仍可被解释为人口的迅速增加:因为男人倾向于娶比自己年轻得多的女人为妻,加速增长的人口起到了减少在相关人群中男女比例失衡的状况。(Bagchi, 1996)然而,经济决定论没有办法解释观察到的现象:即结婚在世界某些地方需要嫁妆,在另一些地方不需要嫁妆(或相反,结婚时可能需要给新娘的聘金)。马歇尔·沙林斯(Marshall Sahlins, 1976)提供了一个更通俗的例子支持这个观点。这个例子以功能派的风格使人确信不移:刀和叉比它们可能“好用”的状况要钝一些,以便保障不意外伤人。但这个例子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最初刀和叉开始流行。

这些考虑表明,经济学和政治学方面个人主义的构架,通过忽略个人价值观和信仰方面的附带的或内在的因素,在精确解释社会后果方面获得了条理性。这些指明了发展必须被看作只是文化(文化的形式“最终由文化价值观所决定”)的一种尺度的概念吗(UNRISD-UNESCO, 1997, p. 5)? 如果文化构架了个人,并因而决定了个人想要作出选择类型的话,那么就似乎暗含着这个意思。² 人的发展不只是集中于个人的成就,而文化具有一种集体的方面:假如是这么回事,那么一个人可以“加上”上述两个方面,以得到对社会发展的综合性的概念。暗含的东西是,无论是在个人层次还是在群体层次,发展的内容对于文化不再是枝节性的。³

批判地检验下述文化概念——即把文化作为单一的、共享的总体和作为本身意义充足、没有外在所指的对象,从而只对众说纷纭的文化确定其含义——也同样贴切。如果经济和经济发展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一部分,那么文化本身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呢? 在集体信仰和态度及规范和价值观方面,如果文化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或不同的时期里没有明显区别的话,那么文化就不可能对理解经济与文化间的互动或界定发展的一般概念具有重要意义。恰恰是因为文化的确是多种多样的,才使得文化获得了理解社会和估价社会的重要性。文化——作为共有的价值观、信仰或行为的复杂体——肯定不是永恒的。文化似乎明显地受到社会结构、竞争和进化的制约。

而且,即使在一个联系紧密、非常稳定的社会群体中文化也极少是铁板一块。在任何一个不复杂的现实社会中——依据地位、权力和财富所形成的专业化、分化、阶层——价值观、信仰和行为也可能有差异和活跃的斗争,而不是简单共享的。信仰—价值观很重要,它是学到的,但学习的机会和动机在社会上有区别。这种有差异的学习也创造了文化的记忆,综合了各个社会在自己特定历史进程中积累的信仰和价值观。因而,文化的进化是一种有社会差异的学

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社会借鉴历史的过去,正视政治现实。文化的构造和斗争发生在一个社会的各个领域,不排除所谓的经济和政治领域:信仰和价值观并不独立于经济和政治的构建。社会制度的建立也离不开信仰和价值观的支撑,即:没有理由认为社会制度不表达文化。

如果制度和文化都不是超历史的,而是相互关联、互相决定的,那么决定的因素是什么呢?在个人的方法解释之外,社会进化的两极化模式可能是明显的。在一端,我们可以设想各社会特定的文化和制度因素是社会和经济进化差异的主要解释:各社会的过去支配着进化的道路。这是一种道路依赖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历史的偶然性发挥了主要作用。另一端,可以认为,所有的社会可以装入一个共同的模式中,产生出一个共同的、道路非依赖性的解答。

最近几年,历史或道路依赖的解释模式已占了上风。莫尔(Barrington Moore, 1987)解释美国、前苏联和中国的权威和不平等模式的尝试就是个突出的例子。他认为,“这三个社会与(各自)前面的社会都存在着历史性联系,这种关系的长期发展,对三个社会中权威和不平等的各自特点提供了解释。各社会都与前政权反其道而行之,试图通过避免或缩小权限不公正的和不平等,对政权加以改进”(第104页)。这种反其道而行之需要改变制度,也需要改变信仰和价值观。在上述三国中(莫尔断言,该论点至少可以普遍适用于其他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一直存在着以一般不愿意接受社会等级、不同集团间的利益冲突以及由等级制和利益冲突产生的社会不平等为一方,与以接受上述一切特定压力的历史为另一方的两派间的特有的抗争。

由于一般模式及历史模式的每个概念是以自己的方式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两者似乎都不允许任何真正自己的角色成为人的能动作用。甚至作为“学习”的文化进化,意味着从限定的对象和经验中学习。文化和经济的决定性为人的自由能动作用,无论是在建设经济和政治制度,或者在选择信仰和价值观方面,都没留任何余地。同时,却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似乎完全免于(以强制的或潜在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影响。但是,要点是伴随信仰和价值观的种种事件是在一种叙事性而不是一种解释性方式的环境中获得解决的,或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安置的。⁵简言之,决定性的参变量根本上具有难以归类的具体特殊性。

社会科学盛行着试图用类似古典物理的“自然法则”的基本原则来解释社会现象。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其聪明才智,一直在探索着说服自己和他人的:在遵照他们所偏好的“社会法则”的社会历史的原始数据中,存在着一种真正的模式。或许,可以公正地说,其结果一直是使人们备尝可望而不可及之苦,而不是具有十足的说服力:太多的能说服人的模式和太多的不能说服人的噪音在聋子们中形成了长盛不衰的对话。

经验显示,我们的信仰影响我们作出选择,我们的选择则会产生深远的后果。当然,经验没有证明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信仰,虽然种种信仰中似乎暗含着这类自由。可能是我们信仰的本身就决定了我们对世界的实际感受,这种感受可能没有被以上所引案例的作者们足够精确地把握住。没有控制意向,人类基本的对将来发展控制能力的观念(以及和它在一块的个人或集体的责任观念)将毫无意义。在我们自己的经验看来,没有意向的信仰没有意义。另一方面,没有信仰的意向也不能导致有目的的行动。承认了意向或创造性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否认遗传性的约束和必须。这种自由和决定论二重性的描绘,比决定论模式似乎较容易与社会生活的事实取得一致。

这种描绘也承认有意义的政治和社会进化的地位。相形之下,自由经济理论中没有政治

的地位。正如经济学家勒那(Abba Lerner)所指出的:“一宗经济交易是一个解决了的政治问题。经济学已通过选择解决政治问题作为自己的领域,获得了社会科学女皇的头衔”(Lerner, 1972, p.259)。这就是说,只有解决了的政治问题允许作出确定性的经济预示。这一定意味着“未解决的政治问题”没有确定性的解决吗?可以认为,政治解决源自特定的历史,并受到历史琐事如此大的影响(道路决定主义)是确定的。但是,另一种强调政治中的叙事性而不是限定成分的假设,会提出一种进化的动力,在这种动力中,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动力都具有自动的和“创造性”的作用。⁶经济的进化和文化的改变二者顺应这个政治性的原动力(在思想和行动的意义上,这个原动力可以改变思想和行动上的参变量),政治在经济进化和文化变化中都承担着中心的角色。政治在此变成了对社会进化中动力创造性作用的一种简洁的表达。

雇用童工的问题

南亚童工的频繁发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证,即试图孤立地利用经济范畴或文化范畴描述社会的停滞和变化都不能使人信服。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声称,童工问题不能在一夜之间得到根治,因而必须延续。两个主要论点支持这种反对禁止童工的现状(以及他们人口中其他能清楚表达的状况)。其一是:童工并不像在西方工业革命全盛时期那样是个大负担,因为大多数童工在家中工作,以此获得传统行业的技巧。另一原因是:贫困迫使穷人家依靠孩子的劳动收入维持生计,因而义务制教育等同于不合理的强制。经济发展为摆脱贫困压迫提供了出路。由于经济发展,大型企业使用雇佣劳动力,现代技术将以低技术含量的家庭企业为代价得以发展。当发展和技术竞争加剧,日益增加的破产劳动力将被现代企业所吸收时,就产生了对教育和技术的增长需求。简言之,照此看来,童工的消失是个简单的经济现象,只是另一种发展的普遍模式。

其他人认为,这种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即使实际上不错的話,但却完全忽略了文化的作用。从历史上看,义务教育已被介绍到许多曾是低收入和普遍贫困的国家和地区(日本、中国、朝鲜、韩国、东南亚以及斯里兰卡、德国、新英格兰和瑞典等国家)。如照威纳(Weiner, 1996)所说,在所有这些国家中“理论和意识形态”是发展义务教育的决定性因素。相比之下,在印度,“政策决定者们继续被一系列阻碍他们采取必要步骤让孩子们上学并摆脱劳动力境地的思想所困扰”。“那些能在其他地方发挥作用的角色们”也没有充分地进行政治参与(p.3014)。换句话说,有益于普遍教育的思想还没有得到那些身在其位者的支持。由于这种解释特别强调文化的特殊性,因而,也需要考虑广阔社会中的文化支柱。如果我们不问及在印度废除童工谁会有所得、谁会有所失的话,那我们的分析依然不彻底。

毫不惊奇,使童工长存的经济利益依不同阶级而有区别。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会从忽略贫困儿童教育(由于可用的教育资源划归给了高一级的教育)的政策中,从可在家庭里工作的童工劳动中获益。⁴此外,一些人认为,引进义务教育也一定意味着限制父母的选择权。与童工是一种经济上的必然产物这一主导观点相反,一项调查发现,儿童和父母亲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被访问的女孩“不认为她们的父母亲关于她们上学的决定是别无他择的”(p.3008)。换句话说,父母亲是以自己的孩子为代价从中受益。

但是,父母亲到底是如何从孩子工作中受益的呢?通常的看法是:父母亲直接从孩子劳动增加的经济收入中获益,这进一步发展到贫穷的父母亲为此多生一些孩子。这忽视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即这类贡献在儿童成长许多年后才能到来;在最初阶段,孩子们都是父母亲资源的消费者,不能在生产上作出任何贡献;在此之后的另一个阶段,孩子们仍然是纯消费者(即消费大于贡献)。只是过了培育期,孩子们才能从收入上向父母亲作出积极贡献。但是在高利率的情况下(通常父母亲的资本获得高利率是可能的),在孩子们身上的投资几乎肯定是净损失。因而,孩子们可能对父母发挥真正的经济“功能”,如果要有的话,不在于提高父母的收入,而在于降低他们经济的不安全性,特别是在父母年老时的经济不安全性。当夫妻年青和健康时,经济上逆境出现的可能性通常较低;因而,他们以生更多的孩子,选择了为降低他们晚年时逆境的可能性,而遭受年青时降低生活水平之苦。晚年时,他们劳动能力弱,而孩子们有较多能力支持家庭。的确,当父母亲没有其他选择和穷人对自己能否成功积攒起来积蓄持怀疑态度时,他们年老时的生活资料可能就是向孩子投资的充足理由。正是在这方面,穷人所做的“选择”必须被看作:不是因为孩子生来可以被用作工人;而是因为他们生育了用作工人的孩子。但是孩子们必须分享父母亲的贫困,一项可能被童工部分地减轻的负担。

但是,对利益的分析还有值得进一步提及的问题。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可能并不重叠。虽然每对夫妇可以把孩子的收入看作是家庭的收益,但是童工的高发生率可能会减少成人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形成童工和贫困相互加强,陷入了低水平均衡的陷阱。同样,雇主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也可能存在着冲突。因而,在一些工业化国家,“低技术、低工资童工的存在,减少了商人要获得能制作具有出口质量产品的复杂技术的刺激”(p.3009)。在这种情况下,开放童工市场实际上限制了长期性的商业和经济的发展。

总之,显然文化和经济因素是理解童工泛滥的两个密切相关的因素。成功地禁止童工和实行普遍的初等教育在经济发展中不像物理法则那样是不可改变的法则。挡在前进路中的信仰、或许甚至价值观都必须加以改变。然而,这种文化转变依赖于不同社会的特定历史和遗产。现存不平等的模式产生了既得利益,这种既得利益抑制了意识形态的解放,阻止了人类发展的政治行为。在印度的例子中,收入和阶级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由继承下来的种姓制度和其他社会阶层的的不平等所混合而成。然而,我们不应把阶级的利益等同于该阶级个别成员的利益。当两者利益相偏离时,个人的行为甚至信仰可能与阶级的利益相冲突。在这些情况下,文化政治的权力改变和文化变化就再一次变得明显了。

J. 莫汉·拉奥(J. Mohan Rao),阿默斯特马萨诸塞大学发展经济学专家、教授

一条通向和谐与平等的全球之路?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人们目睹了日益增长的全球性资源和产品的流动过程,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一过程,特别是在金融资本方面,在过去10~20年间在加速发展,全球化的主要推动来自技术和政策上的发展变化。跨越国界的运输费用——资金、知识和物资的流动——由于信息和传播革命已大为降低。由于一些国家已实行资本自由流动的政策,一些国际贸易洽谈的方式已经减少了传统的贸易壁垒。南方国家和东欧的许多经济模式已经转变政策(在一些地方很急速),向全球市场开放。

有人提出,世界经济在19世纪后期,通过多种措施实现的一体化程度要强于目前的状况(Rodrik, 1997)。但是,这种对比没有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不能证实。19世纪,以从旧大陆到新大陆大量移民形式出现的劳工流动量,确实要比今天的要大。同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的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净资本的流出量,要大大高于一战之后的任何时间。但是,这些劳力和资本流动的大部分,当时都限制在同样的国家集团中(该集团构成今天货物流通中最好最大的份额)。在这类对比中,资金和劳力流动的重要性不能认为与贸易无关。经济可以通过货物流通,甚至在缺少任何其他因素的流通情况下“实行一体化”。现在转到与国家收入相关的贸易额上,经过测量,美国和欧洲的开放程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达到最高峰,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明显回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开始攀升。以这一尺度,1997年世界先进的经济,并不比1897年的更加开放。但是,在这些先进经济中,今日的人均收入增加了好几倍,服务的份额(服务倾向于比产品更具非贸易性)也占得相当多。因而,平稳攀升的贸易率代表着开放度的显著提高。

促进全球化的政策改变已为经济增长模式和伴随的机构变化所限定。虽然,1971年发生了战后时期金融秩序的松动,但60年代后期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增长减慢、1973年石油价格上升等事件对过去的20年里的国际经济关系的形成有明显的影响,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经济关系本身一直是先前原因所造成的后果。先前的原因处于特定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政治经济政权(所谓福特主义)崩溃的环境中,这些国家曾维系着经济迅速增长时期(黄金时期)稳定的国内和国际政权。⁷ 由于福特主义成功地从美国扩散到西欧和日本,通过提高工资带来和维持了高增长率,高工资扩大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市场。与国内需求的增长相伴,美国霸权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也确保了国际贸易没有受到内外平衡冲突的威胁而得以迅速的增长。欧洲、日本的生产力和收入水平向美国当时水平的靠近,加速了其内部工业贸易和投资增长。针对贸易的保护主义壁垒在连续的谈判中也败下阵来。换句话说,收入的趋同产生了市场的一体化,别无他择。

在黄金发展时期南方各国作为一个集团和个体都有可喜的经济增长率。以前曾为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增长超越了殖民地时期的阴暗生产状况。这种差异不仅由于黄金时期的全球经济环境,更多的成分一定是这些国家从殖民地转变为主权国家,国家在发挥着作用。发展的动力平稳地持续到本世纪70年代,部分地是由于许多原材料有较好的出口价格。然而,第一次石油价格的上升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管理产生了严重的危机,用石油挣来的美元流入南方国家,支持了当地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最后的冲突结果是使南方国家,特别是下撒哈拉非洲国家和拉美国家,付出的代价比早期北方国家付出的还要大。利息率的陡涨和随里根—沃尔克(Volcker)80年代初政策而来的对南方各国贸易条件的急剧逆转,使南方国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全球交易的增大流动并非在一个无方向的市场真空中进行。相反,它与精心设计的国家和国际的经济重建密切相关。在北方,保守政策积极提倡“弹性”:通过宏观和微观政策对福特的妥协和福利国家的政治攻击,使得资金可以追求弹性重建的新合理性。这种政治经济环境使得自由自在的资金能够从劳力和国家夺取进一步的让步。在南方,紧缩的国库(反映在由于债务危机引起的国内财政流通的问题)摧毁了各国寻找现代化本地模式的能力以及坚持和扩展反贫困化项目的的能力。由国际债权人强加的、以正统稳定和结构调整计划形式出现的大环境,成为开放这些国家经济,迎来全球竞争之风的主要手段。

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联

人们收入迅速和持续的增长无疑是当代一个良好的标记。这也是我们时代的特点,即每代人都期待和希望在物质上要比前辈做得更好。时常,现代人倾向于在“开始变好”和“变好”之间不做区分。毫不惊奇,我们对发明和创造赋予很高的价值。相比之下,公元1800年之前的经济增长极为缓慢,且时断时续并以快速逆转为条件。对稳定的物质进步的期待与前现代社会相当疏远;相反古代人典型地倾向于回忆金色的、有些神话式的过去,羡慕(如果不是崇拜的话)他们的祖先。因而,前现代社会的生活受到“习惯”和“传统”非常大的影响。

因而,至少广义上讲,经济行为与我们的信仰和价值观有联系,简单地说与我们的文化有联系。我们的愿望,像我们的预言一样,有时自我实现了吗(这种实现会对这种关联作出解释)?如果是如此,文化可被看作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工具性作用。或者说,我们习惯于我们的经济行为了吗(这也可以被解释为文化与经济有联系)?如果是如此,经济上的变化好像创造了我们,即我们的文化。

基于对现在先进国家经济发展的研究,西门·库兹聂茨(Simon Kuznets, 1966)总结道,应当考虑经济发展模式的统一性,它包含着一系列的经济现象和指标。持续的增长率以及模式化规范应被称作现代经济增长。以库兹聂茨的观点,现代经济增长应被认为是由于现代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浪潮所致,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导致了经济组织和生产力的转变。像大多数传统经济学家一样,库兹聂茨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技术力量必然的制度化。但是,他也观察到这种转变伴随着对传统思想、信仰和价值观的破坏。

除了经济增长率具有一定的量的增长之外,库兹聂茨(以及他的追随者)所描述的统一性包括以下各点:

- 投资加速(储蓄和投资率成双倍甚至三倍的增长);
- 人口转变(死亡率和出生率陡然下降,但死亡率大为滞后,这引起了人口爆炸);
- 工业转变(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工业收入份额大为提高,随后以牺牲工业为代价,服务业份额提高);
- 都市化(乡村和都市居民大幅度迁移,居民喜欢都市);
- 以牺牲小型的、家庭式的公司为代价,兴起了官僚式组织起来的大企业。

照这种看法,资本主义在非欧洲地区的发展,将会被认为是技术和相应经济机构从欧洲向外扩散的过程。这明显地意味着,文化只是一个附带的现象,它既不能阻碍、也不能加速这种转变。

这种观点当然与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兴起(宗教信仰和态度的变化也改变了对工作、家庭、物质追求与社区的社会伦理)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有影响的观点不符。这种观点,即只有在文化上(当然是西方所经历的那种)相应的变化才能产生资本主义经济,已在社会学家中成为一种主导观点。那么,资本主义在别的地方发展了又作何解释呢?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可以归结于在与西方文化接触后(通过政治统治和殖民主义时期,以及非政治统治和非殖民主义时期的传教活动、移民、贸易和援助)文化的变化(西化)。在少数情况下,土生土长的新教主义被认为支持了当地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地,文化的惯性或抵抗性则被认为与经济失败的失败有关。